



—— 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 ——

高波◎著

——

廉洁
拐点

——世界难题与中国探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廉洁拐点 / 高波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086-7042-3

I. ①廉… II. ①高… III. ①廉政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D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285477 号

廉洁拐点

著 者: 高 波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1.5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042-3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序 言

中国“第五大发明”与国际反腐新秩序

1550年，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①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②这是对“中国发明”的经典评价。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后来首倡以造

^{①②} 华觉明. 中国的“四大发明”和“二十四大发明”[J]. 发明与创新(综合版), 2008, 12.

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四大发明”，并得到世界公认。在前工业文明时代，四大发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八项规定揭开廉洁拐点神秘面纱

2012年12月4日，八项规定^①这个位列“2013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②之首的缩略语，开始进入中国舆论场，并引发世界关注。短短两三年间，它给这个数千年文明史绵延不断的东方古国带来的沧桑巨变及其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堪与四大发明比肩。如果说后者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成就，厚植了东方古老大国的全球声望，那么八项规定则引领了中共十八大后的治理腐败行动和社会生态变迁，显示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成果和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引人思考的问题是：八项规定冲击波下的中国将向何处去？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下的中国共产党将向何处去？这一切，又将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什么影响？

“全面从严治党总设计师”习近平强调：“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③“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

① 八项规定指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016年12月4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详见《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1版。

② 2013年12月20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商务印书馆在“汉语盘点2013”新闻发布会上联合发布“2013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

③ 徐京跃，周英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OL]。(2013-01-22)[2017-01-2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2/c_114461056.htm.

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①八项规定实质是中央政治局的“自治章程”，但迅速激发了全党的行动感召力和民众的舆论向心力。中华文明历来倡导知行合一，行胜于言。八项规定这个中国“第五大发明”及其引领的正风反腐新高潮，可能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大国廉洁拐点的到来，并且传导出中国由内而外发力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的某种先兆性信号。无怪乎2013年年底八项规定颁行一周年之际，多家美国媒体转载了路透社《中国惩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慵懒官员》一文并引发网友热议，一位美国网友感叹：“我们美国人怎样才能也有个‘中纪委’呢？”^②

诚如众见，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和“习近平时代”的启幕，以及“八项规定冲击波”的巨大震撼，为“改造中共、改变中国”的中兴伟业奠定了基调。这场治理腐败的阻击战、攻坚战和持久战体现出高度的自信力和开放度，因此现场感、同在场感极强。我亦有幸近距离观察并应邀解读中国的“高能反腐”实践（详见后文）。如2013年12月23日，我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时评《一日一贪官落马，中国近“廉洁拐点”》中，谈到中共十八大后，一年来的反贪风暴持续有加，使中国治理腐败的多版本“例外说”越显苍白乏力，“选择性反腐”的高谈阔论不攻自破，“刑不上大夫”的陈词滥调更是无趣。不论位高权重的“老虎”，还是侵渔民利的“苍蝇”，在制度的笼子、法纪的板子和民意的尺子面前，只能瑟瑟发抖。中央纪委通报的多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从基层官员、国企负责人到副部级干部，案例细节原汁原味，违纪人员点名道姓，以开风气的“创举”增加了违纪行为的失德失信成本，也进一步强化了违纪人员的耻感、痛感和孤立感。这并非偶然，而是表明反腐败由浅入深、

① 徐京跃，周英峰.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OL]. (2013-01-22)[2017-01-2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2/c_114461056.htm.

② 贾亮. 专家说“八项规定”：“外国人的中国观改变了”[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12-14(4).

从易到难，步入以量变求质变、以治标促治本的快车道。特别是在2013年的最后一个月里，中央纪委网站平均每天曝光至少一名官员落马，对尚处在“腐败黑数”中的违法乱纪者，可谓冷意逼人；对渴盼早日出现“廉洁拐点”的泱泱国人，应当说带来的是阵阵暖意。稍后，我在2014年第2期《社会观察》上发表了《“廉洁拐点”或加速呈现——2013反腐记忆与2014廉政期许》一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求是理论网等网站转载了该文。

从人类社会的大历史来看，现代国家的廉洁拐点既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政治、法治和改革进程，意味着廉洁公共产品的社会总供给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和趋势性改变。廉洁拐点的形成需要具备相关的基础条件，也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校验，并且往往带来一段国家成长跃升期和治理变革加速期。纵览20世纪以来“地球村”中一些典型国家的廉洁拐点，可将其形成要件或曰最大公约项概括为“6S”模式：“Statesman”，即超级政治家，如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尔宾·汉森、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等；“Strategy”，即正确的战略，如美国的“新国家主义”、瑞典的“人民之家”和新加坡的治国理念——“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Struggle”，即持续的行动，如20世纪头20年美国的反托拉斯斗争、30年代瑞典的贫富协调行动、5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加坡反贪腐行动等，吹响了肃清腐败行动的“开场哨”；“System”，即系统性变革，治理腐败并非停留在“就腐败谈腐败”，而是以国家重组、顶层设计、整体再造和配套措施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有效降低贪腐行为的“出生率”和危害性；“Solidarity”，即社会一致性，各阶层在治理腐败所形成的转型期必须团结一心向前看，共同承担社会转型的成本和利益调整的阵痛；“Share”，即价值的共享，尽管治理腐败的过程或激进或渐

进，或是激进与渐进交替的“混合”方式，但结果是形成一笔“反腐红利”，带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和成果共享的“普惠效应”，并且这种“增量获益”是制度化、可持续的，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转移，也不因政党政策的调整而反复。

再看当下的中国，廉洁拐点既非空降，亦非舶来，既呈现原创特质，又契合共性规律，并且深植于这片国土上的党情国情和党心民心之中，有其逐渐清晰的主题主线和不断成型的脉络轨迹。

首先，治理腐败的核心权威与核心力量举世公认。从2012年11月初至2013年5月的半年间，习近平在36篇公开讲话中有13篇讲到反腐败，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实施了20年来规模最大的“清理门户”行动，八项规定正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全面从严治党的“名片”。2014年，习近平还创下一个月內7次在外交场合谈反腐国际合作的纪录。在他亲力亲为的主场外交特别是“反腐外交”框架下，国际反腐新秩序渐入北京时间。“内打虎、外猎狐”的治腐新局，为党内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联动式再造赢得战略主动，也显示出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2014年年底，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访华回国后的华盛顿商业圆桌会议上坦言：习近平可能是自邓小平以来，巩固执政权力更快、更全面的中国领导人，他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拥有这样的影响力，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①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王岐山随后在署名文章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拥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有着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大党，正处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更离不开核心的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理直气壮、旗帜鲜明，

^① 李博雅，奥巴马评估美中关系表乐观，对美俄交恶感悲观[OL]. (2014-12-05) [2017-01-25].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12/5227823.html>.

展现出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坚持问题导向，对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从不回避遮掩，透视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大势，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赢得党心民心。”^①《礼记·中庸》有云：“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历史地看，中国有“中央治理主义”的政治传统和成功实践，“治理核心”的地位与“核心治理”的定位直接影响中国的“元治理”。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明确以及中共十八大后“习式新政”的落地生根，对当前中国廉洁拐点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说到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治理机制，是中国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件；长期执政党的自我监督能力，是“中央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宋史有云：“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实践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②以中央八项规定为集结号，习近平开启的以上率下、自上而下的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着力建构的从党中央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省市区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党委）直至基层党支部的管党、治党、建党主体责任体系，以及在此过程中其核心作用的彰显、核心责任的担当，堪称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引领实现国家廉洁拐点的核心标志。而且，这一核心权威与核心力量的明确是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完成的，经受了来自“党内外、国内外、网内外”的全天候、全向度、全息化感知认同过程，也具有不同于党史、国史之过往阶段的全新时代特征。

其次，国人信心触底反弹形成的“民意上升通道”有目共睹。直面各种对锐意反腐的围观乃至质疑，习近平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③他

① 王岐山. 全面从严治党 承载起党在新时代的使命[N]. 人民日报, 2016-11-08(3).

② 栗战书.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N]. 人民日报, 2016-11-15(6).

③ 张宿堂, 李斌, 邬焕庆, 等. 习近平谈铁腕反腐: 不是没有掂量过, 但认准了人民的期待[OL]. (2015-01-04) [2017-01-25].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04/c1001-26319746.html>.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得罪千百人、不负 13 亿，宁肯得罪千百个腐败分子，也不可辜负 13 亿中国人民。^①特别是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和加强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有中国特色的“防虎识别区”和“苍蝇禁飞区”高效运作，对特权和腐败零容忍的主流民意空前高涨。2014 年 7 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我曾在人民网发表评论文章写道：“中共的政治信用来了一个‘涨停板’，世界又一次领教了‘中国震撼’，国人又一次感受到‘零容忍严惩贪腐，不设限清理门户’的超强冲击波。这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共始终不渝坚守从严治党路线的一个全新里程碑。”^②民心大如天，信心重如山。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 75%，2013 年是 81%，2014 年是 88.4%，2015 年是 91.5%，2016 年是 92.9%，呈现逐年走高之势。^③此外，中国社科院 2013 年《反腐倡廉建设蓝皮书》的全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3.7%的人对今后 5—10 年反腐败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比 2012 年上升 13.7%；2014 年和 2015 年，这一数据分别为 83%和 90.3%。而在中共十八大前，相同统计口径的调查结果一直在 60%以下的低位逡巡不前。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进行的“汉语盘点”活动中，从 2012 年的“梦”、2013 年的“房”到 2014 年的“法”、2015 年的“廉”，再到 2016 年的“规”，年度汉字的背后也凝结着全社会对治理腐败的共同关注和期待。应当看到，尽管“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

①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图文直播[OL]. (2017-01-09)[2017-01-25]. <http://v.ccdi.gov.cn/xwfbh/zyjw18j7cqhxwfbh/index.shtml>.

② 高波. 零容忍反腐把“纸老虎”打回原形[OL]. (2014-07-29)[2017-01-25].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729/c40531-25365639.html>.

③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图文直播[OL]. (2017-01-09)[2017-01-25]. <http://v.ccdi.gov.cn/xwfbh/zyjw18j7cqhxwfbh/index.shtml>.

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①但通过近四年的“清存量、阻增量、控变量”，对中国共产党人正风反腐的民心支持率和未来信心步入上升通道并逐渐趋稳，这不但是治理腐败“最大的政治”，也是共创未来“最强的动力”。当然，廉洁拐点只是个良好的开端，还必须在深度治理变革的新起点上不断回应人民对公共服务、公平正义、公德善治、公序良俗等方面的更高期待。

最后，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持续夯实治理腐败“去运动化”的实践基础。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产生了高度协同的整体效应，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纪律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等愈加稳健地运行于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之上。一方面，中国特色“制度双笼”（“纪律之笼”和“法律之笼”）更加坚固，在“不敢腐”的压倒性态势下夯实“不能腐”的制度基础。如八项规定引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两准则，四条例”^②被冠以“史上最严”之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犯罪的单纯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情节”标准，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被判死缓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对行贿犯罪增加财产刑以使行贿人得不偿失等，凸显了“依法反腐”、“修法治本”的行动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成功落地，国人见证“最强纪律部队”之时，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标志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应运而生，彰显了以法治方式固化正风反腐成果的决心。《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此改革“位居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交点’”，“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将进一步完善

① 闻言.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思想武器[N]. 人民日报, 2016-12-20(6).

② “两准则”即《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四条例”即《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①我也在相关解读文章中提出：监察“体改”既是对党的监督的强化，也是对党的领导的具体化，其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其体制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其要义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如果说健全党内法规是要“用纪律管全党”，监察体制改革则要“用法律管全体”，有利于杜绝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是防止党的领导弱化矮化、腐化蜕化的治本之策。^②实际上，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关键是在实践中把党的领导的最本质特征显现出来，把党的领导的最核心优势释放出来。在当下的党心民心共鸣期和全面改革加速期，有效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体制，加快排除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中的系统性风险和生态性危机，使“治腐防败”成为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而转移的法治化、常态化事实，是观察评析中国廉洁拐点的重中之重，也将进一步打消国内外对中国政治不确定性的顾虑和担心。

而且，随着习近平时代“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③等管党治党方略不断落地，中国共产党显示出“勇于自我革命”的“最鲜明品格”和“最大的优势”。^④应当看到，在这场以党内治理“全新重启”带动国家治理全面变革的“新治理革命”中，全社会出现了两个尤为值得关注的趋势性变化：一是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步净化所蕴生的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文化心理，

① 人民日报评论员. 构建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N]. 人民日报, 2016-12-05(1).

② 高波. 政治改革和反腐治本的新探索[N]. 人民日报, 2016-11-15(11).

③ 闻言.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思想武器[N]. 人民日报, 2016-12-20(6).

④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N]. 人民日报, 2017-02-14(1).

二是社会监督、网络监督、舆论监督等与党内监督共同倒逼权力内敛和公职人员责任担当的不可逆态势。这两大变化显示出民心向背的时代脉搏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治理红利”，也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中国廉洁拐点的另两大形成要件和重要标志。

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共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全力自我净化的铁流之中，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 240 人（给予纪律处分 223 人），是中共十七大期间审查中管干部人数的 3.6 倍，尤其是严厉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的违法行为，消弭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隐患，显示了自我监督无禁区、反腐惩恶不设限的决心；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116.2 万件，给予纪律处分 119.9 万人，印证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战果和中国纪律部队的“战力”；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 114.3 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 55.4 万人，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辐射效应；纪检机关立案审查和处分的党员人数持续上升，在党员基数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党员受处分率从 2012 年的 1.8‰ 上升到 2016 年的 4.3‰，但纪检机关目前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呈下降态势，2016 年比 2015 年接到的此类举报下降了 17.5%，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回落，彰显了“清理门户、清除存量”的实际效果；2016 年，在强有力的反腐败高压态势震慑下，有 5.7 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问题，2015 年相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是 5 400 余人，主动交代问题的党员干部人数一年间增长 10.6 倍之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综合效应加速显现；截至 2016 年年底，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5 万多起，处理 20 多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0 万多人，群众“看得见的歪风邪气”大大收敛；2014 年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 2 566 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 37 人落网，追赃

金额 86.4 亿元，反腐败追逃追赃力量高度整合^①……在这些数字背后，人们见证了一个建党 95 周年、拥有 8 800 多万名党员、440 多万个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的新生与再造，见证了一个拥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发展史、国家治理史的东方古国和新型大国的全新廉洁拐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廉洁拐点将是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基于执政党的“党内一党外”监督互动机制（即“党内治理开放化”）和治理腐败的“国内一国外”协同联动机制（即“国内治理开放化”），成功展现的第一个“双重外向型”或者说“双向开放化”大国廉洁拐点。在此之前，20 世纪的世界政治地图上，带有地标性质和全球影响的廉洁拐点主要有三个：20 世纪头 20 年基本成型的美国（国家重组型）廉洁拐点，20 世纪 30 年代成功起步的瑞典（福利改善型）廉洁拐点，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发轫的新加坡（法制强推型）廉洁拐点。其中，第一个属于大国廉洁拐点，后两个属于小国廉洁拐点。但是，这些国家的廉洁拐点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出现之前的产物，基本属于独善其身的“内向型”廉洁拐点。

中国展现首个“外向型”大国廉洁拐点

与上述“内向型”廉洁拐点不同的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揭开面纱的中国廉洁拐点，从一开始就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的腐败治理“公约项”与本国治理行动结合起来，体现出积极运用国际国内两种治理资源、两个治理网络、两种治理力量的巨大优势，因此可以说是“外向型”廉洁拐点的典型代表。如 2016 年 11 月 16

^①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图文直播[OL]. (2017-01-09)[2017-01-25]. <http://v.ccdi.gov.cn/xwfbh/zyjw18j7cqhxwfbh/index.shtml>; 罗宇凡, 朱基钊, 罗争光. [OL]. (2017-01-05)[2017-01-25]. 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1/05/c_1120252573.htm; 陈治治. “主动交代”何以一年增10倍[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7-02-12(1).

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秘书处网站发布了中国接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一周期履约审议报告执行摘要,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层更加重视反腐工作,展现出持续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更多腐败案件被成功起诉;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落实工作,修订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并发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章节的主要要求在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中国发展出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引渡、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的法律依据均是良好的实践做法,有利于高效进行国际合作;中国在建立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中发挥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一个有效平台,有利于反腐执法合作等。^①显然,中国治理腐败的持续努力和法治进程是国际社会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范例。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曾指出,治理已成为世界新人道主义原则和全球政治秩序原则,让人感到重读《联合国宪章》的味道。^②中国治理腐败的“打虎猎狐”行动带有重构国际反腐新秩序的实践色彩,也让“《联合国宪章》的味道”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更加广为人知。而且,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海外猎狐是国内强力反腐的延伸。如果说国内是阻击腐败的主战场,那么,追逃追赃则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两者遥相呼应、互为支撑,展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全力治理腐败的政治信用、政治定力和政治贡献。对国际社会来说,这一外向型廉洁拐点的加速到来至少有两方面的显见标志。

其一,实践层面首次实现追回人员超过外逃人员。中共十八大

① 罗宇凡. 联合国网站发布中国接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报告执行摘要 [OL]. (2016-11-18)[2017-01-25]. http://www.ccdi.gov.cn/yw/201611/t20161118_89863.html.

② 戈丹. 何谓治理[M]. 钟震宇,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75.

后，在国内“反腐不设限、正风无死角”的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工作。习近平多次强调，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①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紧盯“人、钱、证”，追逃、追赃、防逃三管齐下，截至2015年11月，已追回外逃人员800多人，首次实现追回人员超过外逃人员，并初步遏制了外逃蔓延势头。^②“天网2016”启动后，包括杨秀珠、闫永明在内的19名“红通人员”归案，新增外逃人员人数进一步下降。^③根据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新闻发布会披露的权威信息，2014年中国新增外逃人员一度达到101人，2015年降到了31人，2016年已降至19人。^④这表明中国反腐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海外“避罪所”坍塌，“海外不是法外”的反腐态势已经形成。^⑤应当看到，海外猎狐第二战场对国内反腐主战场起到合围合笼之效，“逃”海无边、回头是岸，倒逼公职人员收手、“收心”，这正是反贪惩腐、标本兼治的重要成果体现。特别是2016年11月16日，“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此类案件的首次现场直播，标志着中国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大胜利。这也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反腐败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抓[OL]。(2015-01-22)[2017-01-25]。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122/c385474-26433770.html。

② 侯艳。“天网”行动首次实现追回人员数超外逃人员[OL]。(2015-12-10)[2017-01-25]。http://china.cnr.cn/news/20151210/t20151210_520749372.shtml。

③ 李娟。追逃追赃是中国为反腐败国际合作做出的重要贡献[OL]。(2016-12-09)[2017-01-25]。http://www.ccdi.gov.cn/xwtt/201612/t20161209_90886.html。

④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图文直播[OL]。(2017-01-09)[2017-01-25]。http://v.ccdi.gov.cn/xwfbh/zyjw18j7cqhxwfbh/index.shtml。

⑤ 杨晓超。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向纵深发展——写在“一二·九”国际反腐败日之际[N]。人民日报，2016-12-09(11)。

工作组高效协作，实现“重点个案突破”^①的标志性成果，成为国际反腐新秩序加速构建的极佳注脚。

其二，规则层面首次出现中国主导的国际反腐败宣言和相关议程的务实进展。APEC《北京反腐败宣言》成为第一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性反腐败宣言，首度发出反腐败合作应向追逃追赃等务实方向发展的“中国声音”。由此，中国在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方面的贡献有了质性变革，开始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更重的规则议定权、更大的外交影响力和更强的国际协调力。如在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G20领导人一致批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华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等重要成果。《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开创性地提出“零容忍、零漏洞、零障碍”^②概念，推动G20各国克服政治法律障碍，积极缔结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建立反腐败、警务、检务、外交、反洗钱等多部门参与的执法合作机制，灵活运用刑事、民事手段开展合作。同时，中国作为G20主席国，带领反腐败工作组将私营领域廉洁性与透明度、公共领域廉洁性与透明度、腐败易发领域、国际组织反腐败、能力建设等8项内容，设立为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的工作重点，大大提升了“务实合作”的比重。^③在中国力推之下，G20反腐败工作组还通过了《拒绝避风港原则》《刑事司法协助原则》和《资产返还国际合作国别指南》，建立了“拒绝腐败分子入境”执法合作网络等。从亚太地区

① 李娟、杨秀珠、王国强、黄玉荣等从美归案，中美反腐败合作重点个案不断实现突破[OL]. (2016-11-16)[2017-01-25]. http://www.ccdi.gov.cn/yw/201611/t20161116_89655.html.

② “零容忍、零漏洞、零障碍”，即对外逃腐败人员和外流腐败资产零容忍、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体系和机制零漏洞、各国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时零障碍。

③ 瞿芃. 戮力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达成重要反腐成果[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6-09-07(1).